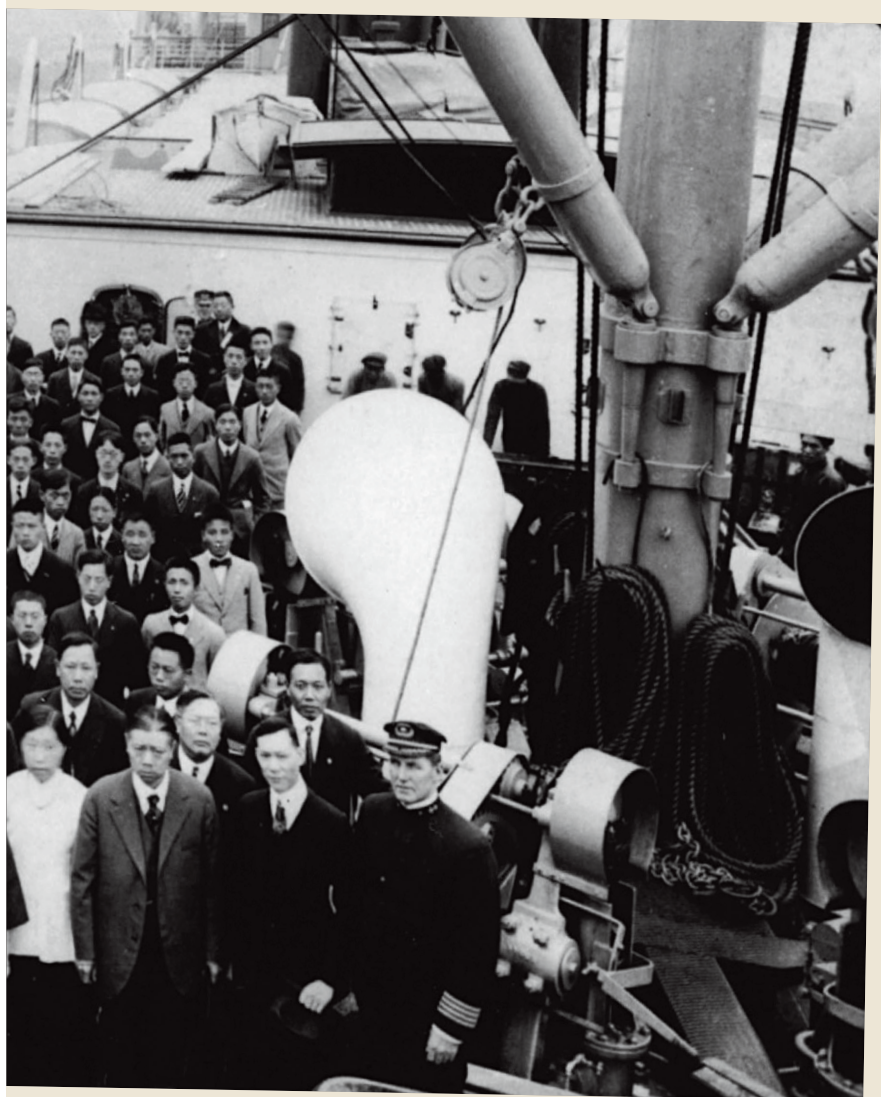


清华留学

○ 本刊记者/关娟 学生记者/刘昱 赵岗



百年沧桑



1847年1月4日，19岁的容闳在广州黄埔港上船，奔赴美国，同去的还有黄宽、黄胜两位同学，三个年轻人揭开了近代中国留学的第一幕，也成为中国几千年历史上赴海外留学的先行者。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回国，在他十几年的不懈推动下，清政府派出了第一批官费留美幼童30人，于1872年8月11日由上海起航，跨越太平洋，经日本横滨到达美国旧金山，后乘火车抵达东海岸的哈特福特，正式拉开了中国近代官费留学活动的帷幕。

之后，中国的留学历程几经曲折、历经沧桑，从19世纪末涌起的留日潮，到20世纪初的庚款留学；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的留学救亡，到抗日战争时期的艰难突围；从1949年后一段时期的封闭，再到1978年之后出国潮的涌起，中国学子的留学历程，紧紧围绕民族命运的变迁，在时代大浪的冲击中百转千回、跌宕起伏，其间诞生了众多对近现代中国影响深远的科学家、文学家、教育家和思想家们。

在这一个半世纪的留学之路上，源于庚子赔款、留学专事而成立的清华大学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从1909年到2009年，百年历史中，一代又一代的清华学子怀着报国理想和求知热情奔赴海外，奋发图强、学成回国，涌现了大批人文大师和科学巨匠，梅贻琦、赵元任、胡适、竺可桢、侯德榜、叶企孙、闻一多、茅以升、梁思成、钱学森、张光斗、杨振宁、王铁崖、季羨林……一个个闪光的名字背后，延续着清华百年的爱国精神和执着追求，让我们回望清华百年留学史，开启新的时代。

清华留学缘起

留学生一词起源于唐代，是由日本人创造的，当时日本派“遣唐使”来中国时，也派来“还学生”和“留学生”，以求深层次向中国学习。中国在数千年历史中，一直以“老大帝国”自居，未曾屈尊向“蛮夷”请教过，只是历史发展到近代，世界格局极大变化，积贫积弱、制度落后的中国，才开始“睁眼看世界”，以求“师夷长技以制夷”。

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清朝统治下封建宗法制旧中国的大门，国人由此惊觉。第一个留学美国的学生容闳于1854年从耶鲁大学毕业，毅然回国，希望“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盼望“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将得以复兴，变成一个开明、富强的国家”。在他矢志不渝的推动下，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奏请清政府，于1872—1881年，陆续选派120名幼童前往美国“师夷长技”。这时期的留学还带着民族骄傲心理，一般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才舍得送去出国，主要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之术。但这些留学生成为“救亡图存”探索的先锋，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国人开始对西方有所接触和了解，社会风气渐渐开通，政府也开始大批派遣留学生赴欧美学习，自费出国留学的也逐年增多。但只在器物层面的学习，和顽固保守观念的阻挠，未能挽救中国的命运。

1894年7月，中日甲午海战爆发，清政府引以为傲、以众多留学人员组成的北洋水师惨败。1900年，英、法、德、俄、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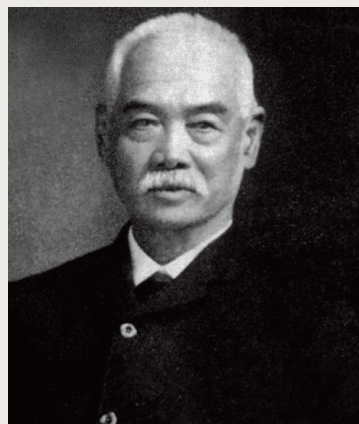
日、意、匈组成的八国联军侵入中国，占领北京，清慈禧太后、光绪帝逃往西安，北京城遭洗劫。1901年9月7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其主要内容之一是向列强赔款4.5亿两白银，限期39年，本息共达9.822亿两，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庚子赔款”。而带有国耻性质的“庚款留学”和后来的清华大学都与此有关。

庚款留学是由庚子赔款的退赔部分用作到国外学习的留学项目，它最早是由美国引起。在八国联军侵华数年之后，美国意识到向中国索取的赔款“实属过多”，1907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提议将美国分到的庚子赔款2444万美元中的超过实际消耗部分减退1078万美元，用于中国办高等教育和招收中国学生留美。经清朝大臣的多方交涉，美国政府于1908年决定退回这笔款项用于派遣留学生赴美留学。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在给总统罗斯福的一封备忘录中说到：“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哪一个国家就能够由于这方面所付出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的收获。”美国此举也有意通过退款办学，培养亲美分子。此后，英、法、比、日等国也先后仿效。

在美国决定退还庚款后，清政府开始积极筹备赴美留学生的派遣工作。1909年留美教育的常设机构游美学务处成立，具体负责留美学生的选拔和派遣工作。不久之后内务部又将清华园拨交学务处作为游美肄业馆，1911年改名为清华学堂。此后，清华学堂就成为培养庚款留美生的学府。

1909至1911年，游美学务处

第一个留学美国的学生容闳于1854年从耶鲁大学毕业，毅然回国，希望“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选送庚款留学生三批共计180名，因为出国前都经过了学务处的“甄别考试”，所以他们被称为“甄别生”。这批学生都是20岁以下的青少年男生，大多来自国内省立高等学校和教会学校，录取后直接派送美国留学。各省的录取名额是由该省所分担的庚款数额确定的，以1911年录取的100人为例，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分别占24、18、17、10名，而边远省份有时几年才有一个名额。据史料记载，当年招考的要求相当严苛：考生除了通晓国文英文外，还要求“身体强健，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

白”。他们学成回国后，许多人成为我国科学、文化、教育、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著名人士，其中包括梅贻琦、赵元任、竺可桢、胡适、王士杰等等。

这批直接留美生抵达美国后所学专业多是化工机械土木冶金以及农商诸科，多是经世致用之学，而非治国安邦之略。然而，当整个世界摆在面前的时候，本是学习经世致用之学的学生们，也被西方政治法律社会所吸引，成为了火种，从美国带回西方民主自由之火。例如新文化运动中的旗手胡适，最初赴美学的是农科，后改学哲学，终多有建树。这一时期的留学也带有明显的“国耻”色彩，虽然这几批留学生都是由公费派出，在国

外生活条件优渥，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屈辱感始终伴随他们，激励他们不断奋发图强，夜以继日地学习。胡适在1912年所作的《非留学篇》中提到：“在及于彼岸，乃采三山之神药，乞医国之金丹，然后扬帆而归，载宝而返。其责任所在，将令携来甘露，遍洒神州；海外灵芝，遍栽祖国；以他人之所长，被我所不足，庶令吾国古文明，得新生机而益发扬光大，为神州造一新旧混合之新文明，此过渡时代人物之天职也。”留学绝对是为了报国、使中国更为强大，这一点是当时的共识。

清华学校留学生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的炮声打碎了清政府虚弱的外壳，辛亥革命爆发，随后中国进入近代史上最为混乱的军阀混战时期，庚款留美计划就此搁置，留美学务处也就此撤销，清华学堂改名为清华学校，由曾经的留美幼童唐国安任校长。由此开始了清华留学的第二个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恰逢中国近代史上的留学高潮。1912—1929年之间，因为“五四运动”、国共合作、实业救国等因素的影响，在欧、美、日本的留学生总数共有约2万人左右。其中从清华学校派送出的留

美生就有968人，是此阶段留学热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使毕业生赴美后能很快适应美国大学的学习生活，清华学校在教育教学等方面，充分借鉴美国学校的经验，对当时的旧式教育进行了一些改革，成为一所按中美双方教育模式建立起来的学校，具有不少比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学校的优越之处。

首先，从对学生的招考情况来看，各地对选拔清华留美预备生的工作还是很慎重的。随着留学风气渐开，清华声誉日隆，应考者多，录取名额少，有时从几千人中才取几十人，考试更趋严格。作为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校的入学考试，侧重于英文程度的考核。上海等地的教会学校和一些官办大学堂平时注重英语教学，学生的英文程度较高，因此，被清华学校录取的比例也比较大。此外，清华既招男生，也招成绩达到录取标准的女生。1914年，录取了周淑英、韩美英、陈衡哲、杨毓英等10名女同学。以后，隔年招一次，每次定额10名，首开国内学校招收女生之先例，通过较为严格的考试程序来录取留学预备生，无疑是社会的一大进步。（见P35表1）

其次，为了使学生不至于赴美后不适应，学校通过多种方式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特别是在语言方面。清华学校十分注重外文教学，规定除国文、中国历史、中国地理、修辞等少数课程用中文教授外，其余课程一律用英语教学，并使用许多英文原版读物作为主要教材，如《鲍尔文读本》、《阿丽斯异乡游记》、《柴斯菲德训子书》、《欧文杂记》、《威尼斯商人》等。由于这一类课程要求严格，且与将来



1 第一个留学美国的学生容闳

2 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奏请清政府，于1872—1881年，陆续选派120名幼童前往美国“师夷长技”

3 留学并未挽救清政府的败势，1901年，李鸿章（前排右二）被迫签订《辛丑条约》

4 1909年留美教育的常设机构游美学务处成立。1911年改名为清华学堂。此后，清华学堂就成为培养庚款留美的学府

5 1909年清华庚款第一届留美学生合影



梅贻琦



竺可桢



胡适



闻一多

“在及于彼岸，乃采三山之神药，乞医国之金丹，然后扬帆而归，载宝而返。其责任所在，将令携来甘露，遍洒神州；海外灵芝，遍栽祖国；以他人之所长，被我所不足，庶令吾国古文明，得新生机而益发扬光大，为神州造一新旧混合之新文明，此过渡时代人物之天职也。”

的留学密切相关，所以学生都比较重视，学习也比较努力，每天花在英文上的时间约有五、六个小时。除正课外，经常组织学生参加级际和校际的英文演说辩论会，有时教师和校长还亲自帮助学生修改演说词。此外，当时学校行政的会议、布告、印行的级刊与年刊，校长及中外名人在校的演讲、戏剧演出等，大半也是用英文。英国哲学家罗素1920年到校参观后说：“清华学校恰像是一个从美国移植来的大学校。”经过这样良好的语言环境的熏陶，许多学生毕业后基本能够做到用英语读、听、说、写，有的毕业生一入美国学校即能在欢迎会上作长篇英文演说。

此阶段的留学生人才辈出，也与清华学校鼓励学生进行初步

的科研活动有关。到高年级时，教师要求学生广泛涉猎的基础上选择一些课题进行研究，写出论文，长短虽不拘，却要别出心裁，不蹈前人窠臼，写出新意来。著名学者潘光旦先生在清华读书时，就曾在教师的指导下，写了一篇名为《小青的分析》的考据文章，深受国学大师梁启超的称赞。

学习之余，留美预备生们的课外生活亦是多姿多彩。同学们组织了多种社团，爱好文学的学生组织了文学研究会，闻一多等都曾是会员，他们常利用课余时间从事翻译和写作。对新闻和编辑感兴趣的学生参加校办的《清华周刊》、《清华年报》等中英文刊物的编辑。对生物感兴趣的学生则喂养了多种动物，进行观察实验。还有一些学生利用晚上时间到学校附近的海淀一带义务为失学儿童上课，此外，学生们还组织有国学研究会、道德学会等。通过这些活动，学生们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锻炼了能力，提高了学习的兴趣。

清华学校这些成功的办学实践为中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近代化提供了宝贵经验。直至今日，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由

于办学的成功，加之清华留美学生在美学习努力刻苦，成绩名列前茅，不少人获得了硕士、博士学位，有的在留学期间就发表了学术成果，清华留学生竺可桢曾在美国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关于研究中国雨量和台风的论文，同时还为美国的气象、地理刊物撰写文章。他们学成归国后，热忱为祖国服务，许多人成为著名学者和我国近代学科诸多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为中国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培养了人才，如叶企孙（物理）、吴有训（物理）、胡明复（数学）、何杰（地质）、周仁（冶金）、高士其（生物）、竺可桢（地理、气象）、侯德榜（化学）、张钰哲（航空）、钱学森（航空）、钱伟长（力学）、梁思成（建筑）、张光斗（水利）等等。

除了科技领域，清华留美生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在教育方面。截至1925年，清华庚款留学生约有620人回国，从职业分布上看，教育界占33.78%，是所从事职业当中最多的。1949年以前，庚款留美毕业生任大学校长、院长者有39人，系主任者63人，教务长11人。如北京大学校长胡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厦门大学校长萨本栋、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等。正是由于留学生的特殊作用，“中国教育在从旧

式体制向新式体制的过渡中，几乎在很短的时间内，完全抛弃了几千年来的传统旧制”。

另一方面，留学生们也在批判封建道德、封建专制，宣传个性解放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辛亥革命以后，虽然清政府被推翻，但北洋军阀的统治毫无民主可言。在西方生活学习多年，深受民主政治影响的庚款留美学者对北洋军阀政府的独裁专制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也有一些留美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教育下，解放前就已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例如施混烈士，现今在清华大学第三教学楼的墙壁上还有他的纪念浮雕。

据对留美预备部学生的统计，清华学生到美国后，分别进入了美国32个州的128所学校，并且大多数集中于东部和中部各州的著名大学。其中有清华学生20人以上的学校17所，依次为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威斯康星大学、芝加哥大学、康奈尔大学、密歇根大学、斯坦福大学、普渡大学、俄亥俄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宾州大学、耶鲁大学、科罗拉多大学、霍普金斯大学、华盛顿大学、宾州州立大学。

国立清华大学时期的留学生

1928年8月，国民政府接管清华，正式命名为国立清华大学。翌年，最后一级留美预备部结束，国学研究院停办，清华大学改归教育部直辖。国立清华大学改变了留美学生的派遣办法，转向全国招考留美公费生。招考对象为国立、省立及教育部立案的

私立专科以上学校的毕业生、服务两年以上并且成绩突出者；或国立、省立及教育部立案的私立大学或独立学院毕业生并且成绩突出者。虽然庚款公费留美生招生范围扩大至全国，从清华走出的留学生依然占据一半左右的比重。1933年国立清华大学招收了第一届留美公费生，以后每年按例招收，连续招考四届，总共录取的92人中，有39人毕业于清华，约占42%。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华北之大，竟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1938年，随着战火的蔓延，清华大学与同样南迁的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在云南昆明组成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公费留美学生的招考也就此暂停。1940年，清华大学单独设立了昆明办事处，专门负责招考留美公费生以及庚款基金使用等相关事宜，公费留美生恢复招考，并在翌年录取了第五届公费留美生17名。1944年又录取了第六届，也是最后一届留美公费生共22人。

留美公费生的费用，由清华留美经费拨付。留美期限为两年，必要时还可申请延长半年或一年。1935年起，录取的留美公费生出国前，还须在国内各相当机关考察或实习半年至一年，目的是了解国情及需要。

从1933年至1944年，国立清华大学考送公费生六届总计131人。其中出现了不少著名的

学者、科学家，例如钱学森、夏鼐、赵九章、张光斗、马大猷、杨振宁等。即使是在动荡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清华学子依然能发扬优良的校风学风，以卓著的成绩蜚声海内外，为我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做出重大贡献。

国立清华大学时期留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留学渠道的拓宽，这一方面表现为以本校自身的财力派遣研究生和部分青年教师出国留学深造，另一方面表现为留学渠道的增加。1933年，国立清华大学规定了派遣研究生出国留学的办法：凡本大学研究院毕业生，其学业优秀者，经所在学部推荐者，经评议会审定通过，可择优派遣出国留学，留学期间不超过二年。至1936年，共派出此类留学研究生14人。留学研究生人数极少，但是精挑细选，所以个个优秀。1934级算学系的陈省身赴德国海德堡大学深造，后成为世界级数学大师，并且是唯一一位获得世界数学界最高奖“沃尔夫奖”的华人。

这一时期除了研究生派出制度，另有交换研究生制度，1935年，国立清华大学与德国远东协会及外国学术交换处约定交换研究生，规定每年选派研究生5名，赴德国进行研究工作，以两年为限。当年交换的研究生包括季羨林、乔冠华、伍正诚等，后来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表1

1912年—1925年清华留美学生人数统计

年份	1912	1913	1914	1915	1916	1917	1918	1919	1920	1921	1922	1923	1924	1925	总计
本校生	16	43	34	41	32	35	67	63	79	76	63	81	63	70	762
女生			10		10		8			10		5			43
专科生					10	7	7	8		10		5			47
总计	16	43	44	41	52	42	82	71	79	96	63	91	63	70	1031

留学渠道的增加主要体现为留学目的地国的多样化。除了向美国派遣留学生外，国立清华大学还向英、法、德、意、日、波等国派遣留学生。其中一部分是清华留美生从美国转赴欧洲实习或留学，另一部分是清华学生和青年教师通过中英庚款公费生考试、中法教育津贴生考试、波兰津贴公费生考试等录取，派出留学。这其中著名的有王淦昌、钱三强、张青莲、夏坚白等。

季羨林老人在《涉沧海，话留学》一文中提到：“尽管在当时留学生出国的目的各不相同，但是也有共同的地方。据我的观察，这个共同性是普遍的，几乎没有任何例外的。这就是：出国是为了回国，想呆在或者赖在外国不回来的想法，我们连影儿都没有，甚至连‘一闪念’中也没有闪过。”

建国之初的清华大学与留学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历经沧桑的清华大学开始一段新的历史时期。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清华由一所延续二十多年并



钱学森



张光斗



杨振宁

形成了自己特点和优势的综合性大学，转变成多科性工业大学，成为“红色工程师”的摇篮。新中国的留学政策大不同于以往。1950至1966年间，出国留学人员由国家统一选拔派遣，留学生的主体由学生变成了教师。清华大学按照国家分配的名额派遣教师出国留学，其中年长的教师以进修一至两年为主，年轻教师则攻读副博士、博士学位。由于新中国在外交上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留学目的地国家也主要以前苏联为主，兼有捷克、德国、意大利、瑞典、英国、丹麦、朝鲜等国，共计派出留学人员149人。（见表2）这一时期出国留学进修的清华教师，回国后绝大多数成为各系教学、科研和党政骨干，不少人担任了党和政府各级部门的领导职务。

此阶段的留学工作受政治波折的影响很大，例如1966至1977年，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十年间清华大学仅派出一人赴法国留学进修。

清华百年的留学历程，可以1978年为界分为两大阶段，两个阶段虽有一些共同点，但在留学目的、留学方式、数量规模等方面都有明显区别。1978年以前，清华在中国留学历程中占据重要地位，从留学人数、留学目的、人员素质和取得的成就方面都可

从1933年至1944年，国立清华大学考送公费生六届总计131人。其中出现了不少著名的学者、科学家。在动荡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清华学子依然以卓著的成绩蜚声海内外，为我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做出重大贡献。

圈可点，留洋回来的学子从各方面引领了近代中国的发展进步。但从社会整体而言，留学范围还非常局限，只有极少数人有机会出国，留学也只是社会大潮中的一股前沿力量，据统计，从1847年到1978年的130年间，我国出国留学学生总数只有14万人。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留学从涓涓细流发展为潮流，据教育部2009年第6次新闻发布会介绍，从1978年到2008年底，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139.15万人，各类留学回国人员近39万。我国出国留学规模由1978年860人到2008年的17.98万人，扩大了209倍；仅2002年-2008年的7年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占改革开放以来出国留学总人数的67%。目前，我国留学生已遍及109个国家和地区。77.7%的部属高等学校校长、84%的中国科学院院士、75%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和62%的博士生导师都有留学经历。留学已成为当下的普遍现象，留学潮汹涌澎湃，激荡中华大地，为数千年未有之壮观，成就中华百年来强国梦。



链接：

2007年，96岁高龄的化学家马祖圣经过几年时间，在美国完成了1840—1949年历年出国/回国科技人员的资料统计工作，由国内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马祖圣先生于1934年从清华公费留美，进入

芝加哥大学，研究工作涉及微量化学、有机化学、药用植物和天然产物等领域，取得了斐然成绩。他这一代留学生真挚的拳拳报国之心，推动他在九十多岁高龄完成此书，希望还原这段历史，以鉴来者，更希望他们深爱的祖国能够利用科技发展壮大、繁荣昌盛。

表2

1951—1964年出国留学人员统计

年份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4	合计
留学人员数	4	8	6	16	31	26	16	2	10	15	7	4	4	149

留学目的也较以前发生变化，我们需要从新的视野和角度来解读留学。

留学潮涌

1978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发生了太多的改变，留学教育新的一页也在这一年被翻开。此年的6月23日，邓小平在听取清华大学工作汇报时做出重要指示，出国留学是我国提高科学技术和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我赞成留学生数量增大，主要是搞自然科学”，“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7月，教育部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的数量的报告》。10月，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周培源坐在华盛顿的谈判桌前，希望落实中美互派留学生的方案，并与美国达成了11项口头谅解。12月，改革开放后的首批52名访问学者启程赴美，我国由此迈出了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清华这一批派出赴美留学的是9位教师，他们均在1981年学成回国（见P38表3）。1979年1月，邓小平访美，正式签订了中美互派留学生的协议。之后，赴英、德、法、日等发达国家的中国公派留学生也陆续踏上求学之途，掀起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留学热潮。

1986年12月13日，国务院发布国家教委《关于出国留学人员工作的若干暂行规定》，明确指出，派遣留学生的政策是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一部分，必须长期坚持。国家提出了新的留学方针，即“按需派遣，保证质量，学用一致”，并相应地将国家公派留学人员由以研究生为主转向着重派出进修人员、访问学者；确定建立公派出国留学人员与派出单位签订协议书的制度，以尽

可能保证公派留学人员如期回国服务。可以说，这是一份针对国家公派留学的一个规定。清华的公派留学在这些年也得到不断发展壮大，据清华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的年鉴统计，1978—2006年清华大学公派出国留学总人数可达3219人。（见P38表4）

公费留学是国家可以直接介入的领域，而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民间自发的自费留学潜流涌动，成为留学的一个主要并且越发重要的组成部分。关于自费留学，此前的1984年12月，国务院曾发布《关于自费留学的暂行规定》，指出：自费出国留学是培养人才的一条渠道，也是贯彻对外开放政策、引进国外智力的一个方面。凡我国公民个人通过正当合法手续取得外汇资助或国外奖学金，办好入学许可证者，不受学历、年龄和工作年限的限制，均可申请自费到国外上大学、读研究生或进修生。各级政府和基层单位应支持和关心自费出国人员。这一针对自费留学的规定让无数的自费留学者有了正式的法规上承认的身份，出国留学的大门从此对普通人敞开。80年代，公费和自费留学双管齐下，相得益彰，而自费留学逐渐超过公费留学比重。1989年之后，留学人数激增，自费留学成为主体。（见P39表5）

探讨30年出国留学热潮的原因，我们不得不承认，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家政策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同时，还有其他一些要素也是值得关注的。

奖助学金体制的完善以及海内外各方面的支持让越来越多的即使家境贫寒的优秀学子也有了出国求学的条件。中国内地各大高校为优秀学子提供出国留学的奖学金这一体制已比较完善，每年都有无数学子申请奖助学金出国求学。海外高校的奖学金也成为有志异域求学之人的重要支持。海外民间和官方各种基金也热情赞助。首先为留学生提供奖学金的有美国李氏基金会(The Li Foundation, 1982)、包玉刚捐设的包兆龙留学生奖学金(1983)等。海外科学界亦热情支持。80年代初，李政道先生发起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计划，到1986年按此计划安排了700多名学生进入美国大学。1981年，康奈尔大学的吴瑞教授倡议把此计划扩展到中美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领域。同年，复旦大学名誉教授、哈佛大学化学系主任、美国科学院院士多林教授发起中美化学研究生计划。丁肇中先生于1982年提议设立实验物理研究生培养计划。陈省身先生于1982年倡议并组织实施选择赴美数学研究生项目。这些外在的各方面的援助，为无数出国求学学子提供了物质基础。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西方文化交流日益深入，彼此了解也越来越深入，刺激着中国人对异域文化、生活的向往，到国外去增长见识、发展自己成为许多中国人的愿望。这种愿望，一旦有适当的经济条件和政策支持，潜在的出国冲动就变成了一种真实的出国行为。

表3

1978年清华第一批赴美留学人员情况

系别	姓名	派往学校	所学专业
化工系	曹小平	伯克利加州大学	理论固体物理
无线电系	彭吉虎	圣地亚哥加州大学	波导光学
工程物理系	张育曼	伯克利加州大学	反应堆物理计算
工程物理系	赵南明	伯克利加州大学	生物物理
计算机系	郑衍衡	普度大学	平行处理及多机系统
自动化系	李衍达	麻省理工学院	地震波的信息处理
水利系	张楚汉	伯克利加州大学	坝工抗震
机械系	柳百成	威斯康星大学	铸工冶金学
化工系	崔国文	麻省理工学院	高温陶瓷

表4

1978—2006年清华大学公派出国留学人员统计表

年份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留学人数	10	51	42	59	46	69	76	158	86	90	79	75	60	54	58
年份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合计
留学人数	91	83	97	109	132	105	110	145	220	219	253	175	176	291	3219

这30年的留学有着鲜明的特点。从总体上来看，自费留学是主体。具体来看，前十年公费留学占绝对优势，90年代开始自费留学迅速发展，渐渐超过公费留学人数。进入21世纪，自费留学已占绝对优势，每年的自费留学比例约占全部留学生的90%左右，如2007年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14.4万人，其中自费留学12.9万人；2008年总人数17.98万人，自费者16.16万人。这说明随着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自费留学已经成为普通大众出国深造的重要而可行的途径。

与此前百余年的留学相比，出国留学的目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上述季羨林先生曾经说过，以前的留学生出国就是为了回国，想呆在或赖在外国不回来的想法“连影儿都没有”。而近日的留学目的则与之前大不相同。不可否认，有不少仍抱着“出国是为了回国”想法的仁人志士，且公派留学的回国者占绝大部分（1996年至2008年回归率平

均为97.65%，2008年回归率为98.34%），但是，相当一部分留学生是抱着“出国是为了不回来”的目的出去的。中国社科院2007人才蓝皮书指出，中国1978—2006年28年来海外留学人员回国率约为25.77%，超过七成留学人员滞留海外。之后随着金融危机爆发，回归率有所增加，但依然没超过三成。国际上一些学者的研究指出，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时期，留学人员的60—65%回国服务，30—35%停留在外，沟通母国与所在国信息，即回归率与滞留率保持在2:1的状态乃为“最佳回归比数”。目前我国回归率与滞留率之比，恰好呈现1:2的“倒最佳回归比数”之态势，远不够理想。

尤其值得珍视的是，在这一跌宕至今的留学大潮中，每一个个体都被还原成了大写的人。他们大多无需面对任何组织的眼光，他们只需要面对自己的内心，他们甚至可以和不同肤色的恋人享受爱情。如同西方的年轻

人成年后会周游列国、体验社会，中国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地把自己丰富人生阅历的一次体验，并在这次体验里重新认识自己，而不仅仅把留学看成一个知识上的提升。

“回到祖国去”

留学是双向的，有流出，亦当有回归。改革开放的前十年，我们主要强调的是流出，大规模向外派出，民间自发向外流出。由于此前30年中国对外留学极少，改革开放初期人才回归也很少。进入90年代，国家在“支持留学”的同时，面对世界科技的飞速发展，全球人才竞争日趋激烈，也积极加入这场人才争夺战中，开始强调“鼓励回国”。1992年，国家制定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方针，建立新的留学人员选派机制，并进一步放宽自费出国留学政策，加大吸引留学人员回国工作的力度，强调留学人员回国工作是“为国服务”，以民族感情唤起归国热情。

1992年是“留学热”与“回国潮”交汇的一年。这一年，邓小平提出：

“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告诉他们，要做出贡献，还是回国好。”上海在全国率先发布《鼓励出国留学人员来上海工作的若干规定》，制定了留学回国人员工作、生活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此后，原人事部、教育部、科技部、公安部等部门先后制定出台了近40个覆盖面广、针对性强、相互配套的政策文件。《关于鼓励海外留学人员以多种形式为国服务的若干意见》，提出了海外人才为国服务的7种主要方式及7条配套的保障措施；《关于进一步加强引进海外优秀留学人才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依托“211工程”和“985工程”等国家科技、教育资助项目引进海外优秀人才；

《关于建立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工作绿色通道的意见》，在科研工作条件、知识产权保护、配偶和子女安排等方面，提出了25条政策措施；《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建立了中国“绿卡”制度，简化出入境和居留手续；《留学人员回国工作“十一五”规划》，提出实施留学人才“集聚计划”、“创业计划”、“智力报国计划”……同时，各地各部门积极创建留学人员创业基地和服务机构，留学人员回国服务网络遍布全国。此前十年的留学工作此时结出丰硕成果，正是吸引学成人才回国的重要时机，一大批海外留学人员学成回国，成为中国现代化飞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此外，一大批致力于吸引海外人才的计划也相继推出。1994年，中国科学院启动“百人计划”，率先以每人资助200万元引进人才。1998年，教育部启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100多所高校聘任了1300多名“长江学者”，近90%的受聘者为“海归”，有力提升了中国高校的教学及科研水平。2003年，“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首次设立，国家对广大自费留学生的关怀和期望在这里体现出来，这也使我国全方位留学教育发展战略得以进一步发展。2004年，国家公派出国留学工作思路确定为：提高层次，扩大规模，保证重点，增强效果。我国留学教育政策更趋完善。

2008年，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面临着引进人才的重要契机。是年12月，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关于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意见》，要求各地各部门解放思想，抓住机遇，大力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中央层面重点实施“千人计划”，从2008年开始，用5到10年，在国家重点创新项目、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中央企业和国有商业金融机构、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主的各类园区等，引进并有重点地支持一批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带动新兴学科的战略科学家和领军人才回国（来华）创新创业。一大批人才引进计划，为我国赢得了大量学术、行业人才，为中国经济文化政治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09年的金秋10月，第一批庚款留学生踏上了去往美国的船只，百年后的2009年10月，从国外归来的一批优秀学子代表齐聚清华园，召开“归国学子喜迎清华百年主题论坛”。他们大都正值壮年，在金融、投资、互联网、生物医学、政治等领域做出了一番成就，而与会者表达的同的心声是：他们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回国，为了心中的归属感而回国，为了建设更强更好的国家而回国。百年前的留学先驱们应该欣慰，因为一代又一代留学的清华学子、中国学子们正为一个更加富强、民主、自由、繁荣的中国而努力着。

表5

1978—2008年出国留学与回国人数统计

年份	出国留学人员	学成回国留学人员
1978	860	248
1980	2124	162
1985	4888	1424
1986	4676	1388
1987	4703	1605
1988	3786	3000
1989	3329	1753
1990	2950	1593
1991	2900	2069
1992	6540	3611
1993	10742	5128
1994	19071	4230
1995	20381	5750
1996	20905	6570
1997	22410	7130
1998	17622	7379
1999	23749	7748
2000	38989	9121
2001	83973	12243
2002	125179	17945
2003	117307	20152
2004	114682	24726
2005	118515	34987
2006	134000	42000
2007	144000	44000

本文的参考资料有：方惠坚、张思敬主编，《清华大学志》（上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宋健，《百年接力留学潮》，科技文萃，2004（08）；马祖圣，《历年出国/回国科技人员总览（1840—194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12月；黄新宪，《略论清华学校在中国留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87（04）；国家统计局编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清华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1993—2006年的年鉴等。

归国学子喜迎清华百年主题论坛

为弘扬留洋清华学子报效祖国、为校争光的优良传统，迎接即将到来的清华百年校庆，2009年10月24日下午，在1909年10月第一批庚款学子留美百年之际，“归国学子喜迎清华百年”主题论坛在清华园隆重举行。清华归国学子优秀代表济济一堂，程宜荪（1977级化工）、武平（1979级电子）、徐志敏（1979级水利）、宋永华（1989—1991博士后）、杨忆风（1980级工物）、邓喜红（1980级计算机）、邓锋（1981级电子）、方星海（1981级经管）、李山（1981级经管）、闫长明（1981级化工）、张朝阳（1981级物理）、祁斌（1985级物理）、



施一公（1985级生物）、张骥（1987级电机）、张帆（1990级计算机）、邓亚萍（1996级外语）等16位海归校友参与了论坛的主题演讲和对话，各位嘉宾从不同的角度满怀深情讲述了自己留学、创业、工作、生活的诸多体会，对话精彩、气氛热烈，为大家奉上了一席激荡的思想盛宴。

本次论坛由清华校友总会主办，中国欧美同学会、搜狐公司、金吉列公司、威视数据、香港百骏集团、芭莎礼品网协办，清华1984级电机系校友毕晓阳主持了整体论坛，共计约300人参加了此次论坛。

针对“海外奋斗、报效祖国”这一主题，搜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朝阳做了主题演讲。作为中国互联网行业的领军人物，他讲述了自己80年代留学美国、90年代回国创业、及至今天经营企业的心路历程和思考，表达了对中国发展方向的思虑和关切。针对“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机会与发展”主题，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方星海做了嘉宾演讲，他指出金融危机下，中国的人才战略、金融体系、发展机遇等问题。兹将主题报告和各嘉宾对话的内容摘要刊登如下，以飨读者。

——本刊编辑部



摄影 / 吴群慧

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机遇

○ 文 / 方星海

我们今天的活动是纪念清华派出留学生一百周年，是清华百年大活动的一部分。我个人觉得派出留学生对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站在一百年的关口，其实是可以回顾一下留学生对中国现代化的作用。我们今天的会议主题，特别是我们这一节的主题——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机会与发展，是比较专一的，就是中国如何抢抓当前的机遇，使我们的经济发展再上一个新台阶。

谈到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机遇，很多人脑子里面就会浮现出“抄底”——哪些地方可以买一点便宜货？大家看的最多的就是资源类资产，石油、煤矿、铁矿等。其实我国不少公司也在抄。但是很不幸的是我们还没有怎么开始大抄的时候，价格就又回来了。我们这一年来也没有抄到什么底，很可惜。

还有一个机遇那就是抄人才，人才据说也可以抄底。我们上海市人民政府金融服务办公室去年12月份组织了一些在沪金融机构到海外去招聘金融人才，报纸上一报道，说“上海市金融办组织机构到海外去抄底人才”！我们自己没有这么想，但是新闻报道会从这个角度来报道，我看到都吃了一惊。招人，要说是抄底，把人家就说扁了，好像这些人是不值钱的，好像是我找不到工作的人才把人家招回来。其实不是这样的。再说，一个在危机的时候被人家解雇了再回国工作的人，或者说经历了金融危机就对美国的体制失去了信心仓皇出逃的人，这样的人也不见得就是一流的人才。所以我不赞成人才抄底的提法。截止2009年年8月底，我们这次一共已经招聘回了70名海外金融人才，都是企业中层管理者和投资、研究、交易、国

际等业务部门的骨干。我们金融办12月份还会第二次派团到海外招聘人才。

再有一个机会就是在国际机构里面产生大一点的影响。因为危机后世界经济金融格局在发生大的变化，中国在其中起什么作用，在哪些方面可以把国际经济金融格局朝更有利于我们国家发展的方向引导。中国的实力现在也是比较大的，应该是可以起一个比较大的作用。但是很不幸，我们缺少人才储备。一年来只有周小川行长写了一篇文章，说要扩大一揽子货币的作用，来协调各国的货币体制，产生了影响。除此以外，也没有其他方面的建议。我们国家还没有到能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TO这些机构里充分发挥作用的时候。

所以危机背景下中国的机遇在哪里？仅仅从抄底这个角度来看，会买到一些矿产资源，但不多；会吸引一些人回来，但是真正一流的人才我们都不会有太多收获。所以说从抄底的角度，我们不会有太多的收获。从机会的角度我倒觉得我们可以仔细分析一下，人家毛病出在哪里？这样我们在设计自己的制度，进行中国制度改革的时候，就可以避免今后在我国发生类似的问题。我们要做好准备。

我们可以问自己这么一个问题：美国这样的国家金融危机中暴露出来的这些问题，如果用我们国家现在的体制去解决，解决得了吗？答案肯定是解决不了。所以我们也不要看见人家发生了危机，我们自己没有危机，就好像隔岸观火，沾沾自喜。因为我们以后也会碰到类似的问题，我们怎么来应对？我们现在发展水平还比较低，我们人均GDP只有3500美元，所以我们还没有碰到这些问题。就像开车，你每小时开100公里，你不会发生翻车，但是每小时开300公里，你就有可能翻车。开每小时300公里的人翻车了，开100公里的人说，你看我水平多高啊，我没翻车！

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来分析他们危机中碰到的问题我们能否解决得了。比如说这次金融危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大家说起源在美国的住房抵押市场做得比较乱，创设了很多风险很大的产品，很多人买了这个产品，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发生。但是大家想一下，我们今后怎么解决我们国家的住房问题，使得绝大部分民众有自己的房子，或者说住得起不错的房子，无论是租赁还是自有？我们去美国住过的人都知道，美国的住房市场是发展得很不错的，美国民众的住房消费水平普遍是非常高的。在我们国家目前这种金融体制下，我们的住房市场还没怎么开始发展，动不动价

格就涨到了一般民众根本无法承受的地步。我们的金融体制做如何的改变才能使得绝大部分的民众能够住得起合适的房子？我们有解决方案吗？我们目前只有完全依靠银行贷款的住房融资体系。这样一种住房融资体制显然是不行的，因为它把所有的风险都集中到了银行体系，为了银行的安全，政府只有默许房价不断攀升。这与让绝大部分民众能住得起合适的房子的目标背道而驰，会造成巨大的社会问题。如果今后我们到了要采用更多的住房融资方式，比如说资产证券化这种方式来改善我们的住房市场的时候，谁能保证我们不会出美国出的问题？

现在大家都埋怨美国金融创新太多、太复杂，国际资本的流动太多，导致了美国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发生了危机。但是大家要看到，美元在全球的霸主地位，作为最主要的国际货币的地位，它是靠非常发达、非常开放的国内金融市场来支撑的。没有这样的金融市场，全球的投资者就不愿意持有美元。现在我们在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为什么要推进？因为人民币如果没有一定的国际地位，我们以后在全球的经济利益是要受到严重损害的。但人民币要有一定的国际地位，我们也需要有一个比较发达和开放的国内金融市场。那时我们能保证金融市场不出现动荡？我们现在的金融市场那么简单，当然出不了什么大问题，就像我们开100公里的时候不会出问题一样。

又比如我们看美国的金融体系，它能够很好地促进高科技行业的发展。刚才前面很多发言的学长都是做科技的，我想他们都深有体会，在美国高科技行业能得到金融的充分支持。我们国家要发展高科技，要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我们目前的金融体系行吗？我们目前的金融体系是高度集中的，金融资源主要掌握在少数几个大型银行中。这种金融体系是无法促进高科技蓬勃兴旺发展的。我们要有更加分权(decentralized)的金融体系的出现，才可能促使高科技的发展。现在这种金融体系不出问题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因为就是这几家大银行为几家大企业服务，什么东西都是国务院统在一起，很多创新而有一点风险的事情不让你做就行了。如果说面对的是一个更加分权的金融体系，千万个中小企业和创新型的高科技企业能够得到金融的支持，那个时候的金融体系我们怎么监管？它与我们目前高度集权的监管体制根本不相容。

再比如说很多经济学家埋怨美国的消费太多，GDP中70%多都是消费，觉得美国人是借钱消费过分导致了这次金融危机。但是大家看看，我们不是一直



方星海

上海市人民政府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198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管理信息系统专业，获工学学士学位；当年通过“邹至庄项目”获得美方全额奖学金资助，由教育部公派赴美留学，于1993年获得斯坦福大学经济系博士学位。毕业后经由“年轻专业者计划”（受聘于世界银行，于1993年至1998年任世界银行华盛顿总部经济学家、投资官员。1998年8月应邀回国工作，历任中国建设银行总行集团协调办公室主任、中国银河证券公司秘书长、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上海市人民政府金融服务办公室副主任。自2007年10月起担任现职。出版学术专著多本，在《财经》、《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等国内外主要财经媒体上经常发表评论文章。

在当今金融市场越来越复杂的年代，在这个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年代，要把市场和政府的边界处理好，是很不容易的事。美国对政府介入市场从哲学的角度给予了基本是否定的回答，所以出了危机。但是你怎么调整这个边界？无论怎么样，市场总是配置资源的基础机制，在这种基础上政府有一定的介入。

想转型，建立一个消费拉动型的经济吗？我们当前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以投资来拉动，前一阵还有出口，现在出口增长变负了，今后也不可能像以前那么快地增长了。现在只能靠投资，但不断地投资行吗？显然是不行的。这就要过渡到以消费来拉动的增长模式，就要有非常发达的消费金融体系来支撑这个消费市场。如果今后有一个非常发达的消费金融市场的话，我们能够保证我们不出问题吗？因为消费金融面对的是亿万万个消费者，其风险管理比面对几个大型垄断企业要复杂的多。

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隔岸观火、沾沾自喜，因为我们只是还没有碰到这些问题而已。今后碰到这些复杂问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解决好？你仔细分析人家这些问题为什么没有解决好，导致了这么一次金融危机？我觉得问题很多，大家都要分析，但是最关键的一点，是市场和政府的边界怎么处理。什么事情市场自己解决，什么事情政府要介入。

在当今金融市场越来越复杂的年代，在这个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年代，要把市场和政府的边界处理好，是很不容易的事。美国对政府介入市场从哲学的角度给予了基本是否定的回答，所以出了危机。但是你怎么调整这个边界？无论怎么样，市场总是配置资源的基础机制，在这种基础上政府有一定的介入。我们学经济学的人知道，市场是最有能力把经济中所有的

信息充分利用起来，使得资源配置达到比较有效的。但是现在看来，当市场复杂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当城市化、国际化、全球化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仅仅靠市场自身的修复力量显然是不够的。美国等发达国家现在也都面临着怎么样重新界定市场和政府边界的这样一种挑战。我们国家目前的情况，政府介入得还是太多了一点，特别是金融领域，使得市场力量发挥得不够。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这个问题今后可能是困扰西方很长时间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国家今后发展过程中要解决好的一个问题。我们国家现在人均GDP 3500美元，到人均GDP 10000美元的阶段，只要保持大致的宏观经济金融稳定，经济不难发展。若有难题，可能出在社会问题上。达到人均一万美元的阶段从经济上看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也不是很值得骄傲的事情。难是难在到了人均一万美元以上，要靠创新来发展自己的经济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体制是否适应。这次金融危机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同时给我们一个加快改革的机会。到2020年人均一万美元差不多可以实现，此前这一段我们在经济改革上怎么样更好地界定好市场和政府的边界，使得我们的体制打好迎接此后诸多挑战的基础。这样，中国经济到那个时候面临的难关就可以顺利地克服。如果我们不打好这个基础，到那时，我们可能就会束手无策，或者是会发生我们自己的危机。



毕晓阳



宋永华



武平



张朝阳



邓锋

【嘉宾对话选摘】 主题一

海外奋斗、报效祖国

宋永华：

我们清华的学子确实要主动参与到体制内。如果不参与的话，只做一个学者，或做一个专家，不去参与设计制度、制定政策，就不能体会到这些思想。要从客人变成主人。我们不止是搞学问，在行业里面虽然有很大的阻力，但正因为有这么多体制机制的问题，所以我们这些人要主动进去。体制内的人有时候看不清体制机制的问题，不能怪他们，让他们来改，他们也不太知道，人事制度的问题、体制的问题等等，肯定有很多阻力在里面。所以要有一个过程，我自己是充满信心的。我回来这短暂的六个月，接受了这么大的转变，从国外到国内，从体制外到体制内。我个人生活也是，产生了很多的改变。但是我个人是充满信心的。确实要把“东”“西”两方面结合起来，不东不西就不是个东

西。只有东和西很好的融合才是好东西。所以我最近也在加深学习，为了我水土不服的问题接受教育。十七大四中全会有两句话我记得很清楚，大家都在谈危机感，我们共产党人，过去先进的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的不等于将来先进，将来先进的不等于永远先进。这句话本身就代表共产党的先进性。

邓锋：

有一次采访的人问我，这一生中你做错了什么事，做对了什么事？我说我做错了很多事，做对的事情我唯一能够想起来的是上了清华。清华带给了我三个东西：第一个是知识，我们在大学五年，大量的时间花在获取知识上，但是我觉得这是最次要的；第二，做事的方法，脚踏实地、不要忽悠别人，这些都是清华教给我们的；第三，最重要的，为人。为人更重要的是在价值

观，很幸运的是我当时是学生干部，就有更多的机会倾听别人，能够在一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中判断，包括想办法说服别人。在为人、在价值观上，清华带给我们很多东西。

我们今天有很多人是一九八一级，这给我们两点启发：一个是理想主义的色彩，理想主义当时可能更多的是爱国主义的东西，现在我们海归回来也是爱国主义。但是再扩大一点，是理想。可能清华带给我们很多人理想的东西更多一些，特别是跟国家的命运放在一起的理想。进一步讲，清华给我们的理想不是虚的，我们能够把远大的理想和脚踏实地的东西结合起来，这是跟北大非常不一样的地方。这是我自己深有体会的一点。

还有一点是集体主义。我们当初创业时，三个人都是清华的。我们能办成企业家协会，是因为我们有一种

集体主义的概念。

但是我觉得也有一些问题。我们太多地讲集体的东西，真正独立的思维、干预批评的东西少一点。如果我给清华提一点意见，就是让学生学会独立，不是人云亦云，也不是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要敢于挑战权威，增加独立思考的东西。还有一个问题，是特别谦虚。谦虚是好事，但是对自己做的东西要敢于承认。如果你太谦虚，有时候你的理念不太能影响别人，你敢于说话，才能影响别人，这一点上，我们不要太谦虚。我感觉自己走过来的一条路，我们在座的很多都已经到中年了，你返过来想自己这一生，我们要有利，还要有名，另外，你的理念能够影响别人，要想做到这一点，你让自己的成功不仅仅是在利上，我的成功能够影响一代人，你必须讲出来，清华人自己的理想不能仅限于我就是给自



闫长明



施一公



张骥



邓亚萍

己赚一点钱，或者是自己给国家做一点贡献，要把自己的理念影响到整个社会，要求我们要有责任，对事情要观察，要独立思考，要说出来。

施一公：

我两个礼拜前回了一趟美国开会，和哈佛大学谈合作，也去了普林斯顿。当时我住在普林斯顿的一家酒店，房间号是343，这是我1992年去美国面试时住的饭店和房间，我两次住在同一个房间。我走出清华，去往普林斯顿，19年后作为客人，又访问普林斯顿，挺感慨的。我在美国求学的时候，很多人说北大人爱国爱得深沉，清华人爱国爱得深沉，我在国外没少惹事。我开始没有想过回来，但是在海外经历过很多事情，从1992年的奥运会，了解到外界对中国队的评论；到1993年中国申奥失败，我感慨很深，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我受不了。美国有一个《华夏文摘》，我在《华夏文摘》上被批斗过五期。我很爱说，也很想说，在美

国通过笔杆子写文章，我是做学问的，但是我写了不少文章。在美国，从《华盛顿邮报》到《华尔街日报》，我都写了很多文章。我很想作为第四种声音评论一下，在美国那段时间，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且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邓亚萍：

我的经历可能跟几位学长有所不同，因为领域也是非常不同。我不能说是回国，是应该回来。因为本身出去就是为了国家，也是国家送我出去的，包括在清华，包括在英国留学。真正意义上是1997年开始在清华读书，后来在剑桥毕业。在这个过程中，成为国际奥委会的运动员委员会委员。在国际组织里面，你非常清楚你代表的是谁，在这个国际组织里面，你甚至不仅仅代表的是中国，同时你还代表着亚洲，还代表着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运动员，还有这些人的声音。国际奥委会是一个制订规则的地方，也许很多中国人本身的文化就是太含蓄、太有内涵了，而

不愿意非常地去张扬自己的个性。以至于我们在国际组织工作的时候，我们显得太含蓄、太谦让。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影响我们积极地去争取一些利益，争取一些有利的政策，这和我们整个中国文化是有关系的。但是在今天的这个世界里面，特别是在各个领域，我认为不仅仅是在体育，在各个领域，你不去争取，就会失去一些机会，你不去争取，就得不到政策的倾斜。在国际体育组织也是一种竞争的状态，去残酷地争取。当然这个争取并不是为了我个人。我很荣幸的成为国际组织一员的时候，你不得不承担这样一种责任，承担这样一种使命。

很多问题的瓶颈恰恰是在我们这些制定政策的人身上。我在共青团工作，目前政府的主要领导者清华人越来越少了。在原来部级以上领导，清华占据着相当的分量，相当的人数。但是现在咱们清华的学生可能更加务实，去从事一些创业，特别是发挥我们学校特点的项目，包括IT、融资、金融这一类的行业。而不是特别

愿意到从政的道路。但是不要忘了，制订政策的部门是在政府。每一个行业里的政府职能部门是制订政策的主要决策者。就像我在国际奥委会一样，国际奥委会是制订奥林匹克比赛具体游戏规则的地方。如果你没有人能够进去，他就会制定一些不利于你的政策，因为你没有人说话。刚才几位都说到了这个问题。有一些政策的问题，为什么？就是因为有一些人没有这样的意识。我非常愿意，也非常鼓励我们清华的学生仍然沿着我们老一代的清华学子的脚步，应该百花齐放，不仅仅是要坚持我们的专业，同时也应该继续积极参与政治工作，继续参与政治活动。因为清华是中国的脊梁，清华的学生一定是在每一个时期为中国的繁荣富强做出最重要贡献的一分子。对于政治的工作层面，我非常希望我们清华仍然关注这个领域。所以也是借此机会非常感谢清华给了我这样一个好的机会，特别是这么多年对我的培养。特别是对于我树立一个人生观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

主题二

中国的机会与发展

杨忆风：

我从一个投资者的角度讲两个感想。一个是作为一个基金经理，个人的纠错能力，是这个人能不能成为好的基金经理的要素，尤其是自我的纠错能力。你不要等到被市场打得鼻青脸肿再纠错，就已经晚了。对一个国家同样是这样。我们以前在国内，共产党是最具备自我纠错能力的党，所以领导我们中国走到了今天。但是有两点很重要。我老回去美国，一个季度回去一趟，比较国内外，我们作为大国的心态和很多气势都出来了。但是我们具备不具备一个国家的自我调控和自我纠错的能力？我感觉美国的纠错能力是非常强的。就我在美国华尔街工作的经历，觉得他们在金融危机后期政策方面180度大转弯，让很多人吃惊。让我去赌一下，也许我会赌一半一半，他会不会救雷曼、AIG，后来救AIG，包括很多高盛以前的CEO做了很多努力，但是美国的政府系统做了很多事情。我们投资界现在讲，世界上下一个泡沫在哪？很可能在中国，会不会出现呢？像日本这样的每一个大国经济起飞的时候，都经过泡沫阶段。下一个泡沫出在哪，巨型的泡沫出在哪？最可能在中国。全世界的资金都在往中国涌，这个压力非常大。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下一个危机很可能会发生在我们头上。我们有信心不发生在我们头上吗？

李山：

我们清华的学生有各行各业的，我们有远大的目标，我们很爱国。我们要实实在在在结合中国国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审时度势把事情做好。今天我们中组部管人才的领导也在这里，我替我们归国学子，尤其是清华的归国学子讲几句话。我虽然还是做出一点成绩的，但是比起我们很多的学长，还是对国家的贡献太小。我第一次回国是给朱镕基学长写了一封信，我说要办中国自己的投资银行，我当时写的理由不是为了赚几个钱。我说第一个理由是为了更好地吸引留学人才回国。如果留学人才一个一个回来，到一个单位去，你刚开始不可能让他当一把手，只能适者生存。都适应了，跟别人一样，你还要他留学干吗？还不如一把手请留学人才来做，比如说我来做，后来我还真的做了。我后来请了很多的海归，把很多原来的老人员、老干部都裁了。到我离开的时候，我们公司（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上市当年就是第一，不光超过中国公司，还超过了高盛这些公司。这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平台，而不是一个个单个的问题。后来我为什么要离开中银国际？也跟人才有关系。

祁斌：

第一个话题，我们在金融危机中的机遇。这次的危机对中国来说，客观上真的是一次机遇。因为全球发达



程宜荪



徐志敏

国家经济的减缓和衰退，使中国内在的潜能爆发出来。今年中国的GDP增长率是8%。中国和日本GDP的差距是15%。今年我们是8%，如果我们GDP再高一点的话，今年就超过日本了。中国权重股在全球占的重要权重股不到3%。最近的变化是中国A股大跌，结果道琼斯大跌，说明我们对全球有影响。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说明我们整体实力的提升。但是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设施、机制、效率、制度安排都是非常落后的。如果这些制度的改革不能跟上的话，是有很大的风险的。也可能有事，也可能没有事。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曾经非常辉煌，最辉煌的时候，全球十大行业银行日本占了七个，今天一个都没有了。日本东京的一个酒店叫做帝国花园，它的价值超过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全州的地产。但是很快灰飞烟灭了。我上次去日本访问，在日本东京机场，发现很有意思的现象，每一个登机口都挂一个牌子，从哪飞哪，我看从东京飞北京、东京飞福州、

东京飞沈阳，我突然想，东京机场成了国内机场了。

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话题是人才回国的问题。抄不抄底，客观上他也会回来。中组部人才抄底的战略我觉得还挺管用的。去年年底在美国招人，15分钟以内递上一百多份简历。今天，华尔街上的每一个中国人都认识到他们自身的职业生涯最大的期望在中国。有人说中国证券公司要找美国的首代，我说你不如留在这边做首代。他们老问我，回来怎么找？怎么办？我说你直接回去，你把这份工作辞了都行，回来找我。他们说现找，找不着怎么办？我说找不着就卖冰棍，你卖冰棍都可以卖成世界上最大的冰棍连锁店。现在中国的发展的确对海外人才有很大的吸引力。我们证监会这次一共招了19个人。后来我们领导让我跟他们座谈，作为一个老海归，我跟他们讲了几条：第一条就是从零开始，我2000年回国的时候，当时我们在芝加哥大学一个同学就跟我讲，国内人际关系多复杂？你行不行？我当时脱口



杨忆风



邓喜红



李山



祁斌



张帆

而出，八年以前我背着军挎来到美国，八年以后是现在这样。再过八年，我照样可以背着一个军挎回去。我说你们不回来中国也崛起，你回来以后还可以参与一下，还可以有这段经历，你要这么看待这个问题才能够把心态摆正。

2002年证监会刚开始批QDII的牌照的时候，证监会来了一个日本人，他在日本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日兴资产管理公司，叫官里。他一进来，就跟我鞠了一躬，一进来跟我说英文，还好我会英文，后来基本上说清楚了。我很好奇，说你们日本人英语不太好，你怎么说这么好？他说我是中国人，叫某某，是某大学毕业的。他把姓改成官里，我当时非常生气，我说八格牙路，你给我出去，你把日本名改成中国名再回来。他好不容易在日本挤了十八年，好不容易挤成了日本人，他当然不想再改回来。我们批了他的QDII，他当年在日本做的业绩是120%，在中国这个算盈利很差，但是在日本做成了SUPPER STAR，

日本的钱投进去，一年回报120%。当时他在日本到处演讲，在日本提高了好几级，对我们特别感谢。2007年我去日本访问，他听说了，说我回东京陪你。我说你在哪？他说在上海，他最后还是飞回东京了，陪我吃了一顿饭，然后再飞回上海。我说你一年多少天在上海？他说有三百多天的时间在上海，把他儿子接回上海了。他说他准备自己干，准备成立一个PE基金。上个月又来到我的办公室，递上一张名片，某证券国际部总监，正式彻底地回归了中国。我说这个人七年中的变化，由他羞于承认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到加入到一个中国的金融公司做国际部总监。我说你总算是回来了，回来还算早，再晚点可能都没这位置了。

我觉得还是要加快改革步伐，坚定不移地推动市场化的建设。日本几乎犯了所有经济学上的错误。核心是他的金融体系不够市场化。欧美的体系不是一个金融体系，美国是美国的，欧洲是欧洲的。所有的差别是谁的市场化更高，谁的效率更高

而已。我们要我们的经济体制更加市场化，更加开放化，我们在开放的环境下才更有竞争力。我说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海归？海归回来有两类人比较失败，一类是回来以后发现融不进中国的现实，最后成了愤青，天天批判现实。写文章骂大街，就彻底失败了；另外一类是自己变成一个官僚，这不是我们需要的。第一，你要适应这个环境，第二，你要改变这个体制，而且要向着对的方向去改变。作为海归和国内的同志，我们都应该学学小平同志，邓小平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海归。他最早出国留学，然后把学回来的东西适用于中国的国情，提出了改革开放。他因此名垂青史。

张帆：

从这些嘉宾的发言中也感受到了我们祖国发展令人振奋的前景。但大家对我们国家下一步往前走所要经历的道路和坎坷，心中都有担忧、有疑虑。套用一句话，目前这个时代是最好的时代，同时也是最坏的时代，是最恶

劣的时代。我们这一代人如何把握这个机会，就成为我们大家心中一个特别重要的问号。前两天我在英国《金融日报》上看到一篇专栏很有意思。引用了一个经济学家的金融不稳定理论，这个理论现在我还没有买到专著来研究它，但是据说这本理论解释了传统经济学理论没有办法解释的，为什么这么大危机之后出现了这么快速的反弹。在一部分商品和服务严重需求不足的情况下，还能出现资产、股市、房市大量泡沫的产生。金融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服务性行业。它成了经济服务领域的重中之重。他说目前全球的经济复苏其实是下一个泡沫的开始。按他的话，可以感觉到2010年初将会有更为猛烈的危机。当然各国还会再一次猛烈的刺激，中国目前的状态，包括我们国家的国有企业目前正在做的准备，能不能应对？我们又是最大的商品国，基础性材料的进口国，在这样一个振幅越来越大，振动周期越来越短的国际经济发展周期内，我们应该怎么办？